

民进党与台湾新世代互动模式评析

李仕燕^{1 2}

(1.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华南农业大学 思政课教学部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世代政治学强调不同的社会变迁都会影响不同世代的政治取向、政党认同和政策诉求。在“太阳花学运”爆发后,民进党致力于与新世代保持积极互动,一方面获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催化新世代力量的崛起,形成独特的互动模式。

关键词: 世代政治; 民进党; 新世代; 互动模式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5)03-0014-08

DOI:10.14157/j.cnki.twrq.2015.03.002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全球政治走向。台湾地区从国民党威权统治体制逐渐过渡到以政党政治为特征的民主宪政体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出生的台湾新世代,享有父辈们所不具备的优渥物质条件和以普世价值为内核的意识形态范式,造成台湾社会的政治取向、政党认同与政策诉求上出现“代际差异”。近年来,这种“代际差异”集中在洪仲丘事件与“太阳花学运”上爆发。相较“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具有革新气质的民进党更易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尤其在蔡英文第三度执掌民进党以来,致力于与台湾新世代的积极互动,推出一系列颇具吸引力的青年政策,成为该党重新获取政治资本的主要手段。本文将借助世代政治理论,分析当前民进党与台湾新世代的互动模式及其现实效果。

一、世代政治学视角下的台湾新世代

(一) 世代政治学理论

在政治科学研究中,以年龄为主要参照,以共同政治态度为内核的生命进程理论与世代政治学,一直因其对青年政治行为研究与评价所具有的较强解释力而备受推崇。世代理论致力于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群体的世代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以及代际关系性质、代际互动模式、世代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问题。^[1]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对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世代做出区分,他指出“急剧的社会变迁使得一代人有别于下一代,从而产生了一种可能,使得每一个新生的青年一代能发展其独特的精神和行为方式”,而根据对“共有经验材料”的态度的不同可以将同一现实世代的人划进不同亚群体

基金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专项课题“台湾青年世代群体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力研究”(TZ2015002)

作者简介: 李仕燕,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华南农业大学思政课教学部讲师。

即“世代单位”(generation units)。社会与文化的变迁速度越快,一代人就越多可能产生一种共同的世代意识,即体验到一种“具体的联系”或“参与一种共同命运”的感觉,与此同时,每一延续的世代之间则越可能产生明显的“经验上的分层”,其结果是形成了独特的世代风格。曼海姆强调,当社会变迁加剧时,青年重新接触传统的价值观和准则之后进行的反思,将会产生一种对社会的更新作用。^[2]

理查德·布朗加特和玛格丽特·布朗加特进一步明确提出:世代(generation)不仅需要“在相同的时间间距内出生,并且共同成长”,同时需要“形成一种年龄群体意识,还带有鲜明的态度和行为,与社会中其他年龄群体之间有显著差别”。当同伴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意识到,他们基于共同的年龄群体的观念以及作为政治变革中的积极力量而被结合在一起行动时,同伴群体则转而成为“政治代”了。所谓的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也就是指出生于同一时期,倾向于相近政治态度的群体。他们强调当某一年龄群体反对现存秩序而相互结合在一起,并且把试图更改政治进程作为其“代”的使命时,就表明一个政治世代形成了。^[3]

台湾政治学者胡佛认为“青年人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历程中,一直都扮演着密不可分的重要角色;因青年人是社会中坚知识分子,在任何政治社会变迁中,经常居于推动者的地位,他们的政治态度定向,无疑将会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前途。”^[4]新世代作为政治系统的新参与者,其参与政治体制内的各种政治活动的意愿、政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度都对政治系统的存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现代政党政治体系中,政党具有支持民主、管理冲突和促成冲突、改善权力的分配、监控“游戏规则”、增加选民、征募和训练候选人、增加竞选运动和通知投票人等职能。^[5]政党的运作在客观上起到了世代间联系与对话的桥梁纽带功能。因此,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根据新世代的族群特质变化,争取他们的认同支持和政治参与,并从中选拔合意的发展对象,通过正规的竞选学习和非正规的经历来训练“接班人”,是政党精英再生产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性工作。

(二) 台湾“新世代”的世代政治学界定

年龄是世代政治学理论最早关注的“世代”分界点。现行台湾内政部门的人口统计,通常以“0-14”(幼年)、“15-65”(青壮年)以及“65以上”(高龄)三个年龄段来划分,其中“14-65”年龄段目前为1 733万多人。^[6]但R.赫伯斯通过行为科学路径发现,年龄40-65岁、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世代倾向明显不同于年轻人,后者很可能是前者的对立面。^[7]除去“0-14”的幼年期,本文认为取“15-40”为“新世代”的年龄界限较为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也持相似的观点。^[8]

但年龄仅是“世代”区分的一个方面。德国文化历史学家W.狄尔泰将“世代”界定为一种从质上理解的、同时经历了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及其影响的人群范畴。^[9]因此,对台湾的“新世代”的界定并不单纯以“年龄”为界限,应着重于他们的共同生长环境、共同记忆以及共同心理诉求。台湾学者游清鑫曾以“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的“新选民”为界,划分为“前92世代”与“后92世代”,发现不同的政治世代的政治价值观差异明显。^[10]大陆学者朱峰、刘玉军和马立平在此基础上,归纳出“1992世代”、“1998世代”与“2008世代”各自不同的世代角色,并认为这三个世代已完成从对民主的“追求”到“适应”与“维持”民主绩效,再到“反思”民主运作的角色转换。^[11]

台湾作家张铁志认为生长在经济腾飞与政治民主化的时代,台湾“新世代”最大的特征在于价值观的转向,即越来越多人属于美国政治学者Ronald Inglehart于上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价值观。他们更重视自主性、自我表达和非物质的价值满足。相较于单纯追求财富,而安于现状秩序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则更重视政治参与,甚至会参加“非传统的政治抗争”,诸如示威、罢课、占领建筑物,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并对执政者施压。^[12]这种观点可从2009年台湾《远见》杂志发布的两岸年轻人价值观调查报告中得到一定的印证。该调查发现“自由自在”位列

台湾年轻人的人生目标第一位,其次是“家庭美满”和“工作稳定”,高达36.2%的台湾年轻受访者认为“成功”是“实践自己的兴趣”,其次为“拥有专业技能”及“高薪”。^[13]

W. 狄尔泰强调“世代”要有共同经验才能产生共同诉求。台湾社会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政治急骤转型期,衍生出“新世代”身上两个明显的新特点:一是政治的历史悲情已难觅踪迹。他们对《马关条约》、“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等影响近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大事件的认知与记忆大多来自书本,悲情难激起他们的共鸣。二是普世价值观的根深蒂固。大部分“新世代”见证或参与岛内两次政党轮替。在民主教育普及化与各种选举实践洗礼后,他们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观的认同度远高于经历过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父辈。这两个特点与“后物质主义”相叠加就令台湾“新世代”更多地强调自身价值的自主性与自由度。

基于世代政治学理论,本文认为当前的台湾“新世代”应该界定为处于15-40岁之间,具有明显的普世价值观与诉求,对台湾社会发展与人生规划更着眼于实现自主性与自我价值满足,并愿意为之付出,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年轻人。

(三) 台湾“新世代”与民进党的关系

青年是台湾社会选民中的重要群体。争取年轻群体的认同与选票是民进党创党以来的重要政策内容。大陆学者张文生和王茹在《民进党选举策略研究》一书中,单独从民进党的青年政策与动员方面,论证该党在吸引青年选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14]事实上,民进党自“党外”时期开始就以“政治世代”来实现政团到政党的价值建构与传承,并形成了“美丽岛世代”、“律师世代”、“学运世代”与“幕僚世代”。尤其是“学运世代”与“幕僚世代”大部分介于“新世代”年龄上限的40岁左右。他们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历或目睹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一些人在大学期间就已参与民进党的政党运作,或曾亲自参与诸如“野百合学运”在内的民主运动,或担任该党党务、行政主管或地方公职人员的助理。相较于注重论资排辈的国民党,民进党给予这些“新世代”更多的政治历练机会,并成立党内的青年发展部,负责青年工作的推动,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加入。尤其在蔡英文担任党主席以后,“新世代”的作用不可小视。

2008年蔡英文首次执掌民进党时,为消除“扁家弊案”的负面影响,致力于解散派系,消除“天王天后”的老面孔,力主让青壮世代接班,树立清新形象。2010年的“五都”选举是民进党与新世代互动的重要分水岭。为争取年轻世代的选票,民进党在“五都”均组织了300-400人的“青年种子部队”,深入各大学院校发展和组织支持者。其中又以亲征新北市的党主席蔡英文的青年军——“小英之友”最为活跃。面对拥有行政资源的国民党,蔡英文以“I love new,新幸福、新时代”为主题,发动年轻世代成为“小英之友会”志工团队,作为其“分身”,随着“小英行动加油站”胖卡车,一边募款,一边跟市民喝咖啡、聊选情、办草地音乐会等,方式灵活多样。在竞选期间,小英行动加油站在新北市29个乡镇市共巡回125场,通过喝咖啡方式和民众面对面接触,落实蔡英文的“市民主义”。此外还有“小英的幸福快递”和“青年乐活单车队”,由数十位年轻人组成,每台单车沿途播放蔡英文竞选主题曲《I love new》,深入大街小巷分发竞选文宣与政见。^[15]尽管蔡英文在“五都”选举中并未获胜,但民进党与“新世代”互动所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在此后的2012年“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蔡英文带领民进党走出2008年败选的阴影奠定坚实基础。^[16]

二、民进党与台湾新世代的互动模式

(一) 结合“公民力量”,诉诸普世价值观

2014年3月,在蔡英文第三度当选民进党党主席前的两个月,以台湾“新世代”为领导、不满马英

九当局施政的台湾“公民力量”为主体的“太阳花学运”爆发,给处于已在野六年,力图重新返回“中央”执政的民进党带来不少政治压力。因此,不管是以平民身份现身“学运”现场表示支持,还是在就职党主席的演讲内容中,蔡英文积极主动与“新世代”所代表的“公民力量”互动。当选后的第一个公开行程,蔡英文透过媒体表示欢迎青壮世代参与探讨包括两岸政策在内的民进党政策,^[17]以民主、平等与开放的姿态向“新世代”伸出橄榄枝。

在蔡英文的主导下,民进党推出用于与“公民力量”互动的两个公共政策探讨平台:涉及全民的“公民经济会议”与“公共宪政会议”以及针对“新世代”的“青年议会”。后者聚焦“新世代”生存发展与关心的议题,率先透过网络收集青年提问、意见,再召开实体论坛,最终将凝聚共识,邀请年轻人参与民进党中常会、与党公职人员交流,将意见纳入党的政策讨论中。民进党将“青年议会”定位为一个讨论公共事务、意见汇流的场所,透过多层次且有深度的讨论,让意见更具影响力、公民力量深植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也让民主得以深化。^[18]这个定位与极具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的“新世代”的政治理念相吻合,迅速受到“新世代”的欢迎。在“青年议会”获得“新世代”热情回应后,蔡英文在纪念所谓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五十周年”的相关研讨会上,盛赞以“太阳花学运”为代表的台湾年轻一代的“行动和勇气”,并认为“‘国家’主权的未来,让民主继续的深化,让下一代人能拥有一个完备的民主制度,让下一代决定自己的未来”。^[19]

(二) 有步骤地选拔培养“新世代”政治精英

世代政治学认为,年轻世代正处于年龄增长与认同结构变化的变化期,左右其政治认同的因素相当复杂多元。若要转化成为政党政治的实际参与者,需要更多的政治训练,实现从“政治世代”到“政治精英”的转换,成为政党存续的继承者或忠实支持者。年轻世代曾在2010年与2012年两场选举给予蔡英文极大的民意支持,巩固了她在党内的“共主”地位。在积极回应“公民力量”的同时,如何实现“公民力量”与民进党的有效结合,将“新世代”纳入该党长远发展的战略中,选拔与培植“新世代”中的政治精英就成为蔡英文卷土重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蔡英文的主导下,民进党有针对性地推出“民主小草2014青年参政,翻转基层”计划(下称“民主小草”计划),针对2014年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强调愿意支持对当前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敢于投身选举的年轻人。在民进党第十六届第一次全会上,蔡英文以“成功不必在我”^[20]的理念一面说服党内各派系,另一面则强调“新世代”应当着眼于培养“问问题”及“组织”两种能力,^[21]进而表示愿意“把民进党累积的选举经验和人民挹注给党的资源,当作公共财,转投资到有志参政的青年身上”。甚至放宽党籍条件到“参选人不一定由民进党来提名,只要有意参选,做足了心理准备和规划,无党籍参选人,也会尽力支持”,^[22]得到大量“新世代”的追捧。

2014年9月初,民进党从近百个各乡镇市区的报名资料中,经过三个梯次、9位评审严密征选,顺利产生50余位村里长及乡镇市代表参选人。蔡英文亲自出席“民主小草”候选人的亮相记者会,强调“参与就是改变政治的起点”。^[23]在整个“九合一”选举过程中,这些“民主小草”始终受到蔡英文的关注,或与当地县市长的民进党候选人形成“母鸡带小鸡”的帮扶关系,或由党工协助拟定竞选政见,设计候选人全岛扫街活动。^[24]从结果来看,虽然仅有15位“民主小草”成功当选乡镇市代表与村里长,但排除投入时间不长,且知名度很低的劣势,这50余位“民主小草”在政治参与的经验上的收获,将会影响其未来的人生规划与政党认同。“九合一”选后,蔡英文表示将继续“积极培养青年干部投入地方耕耘”。^[25]可以预期将会有更多的“民主小草”的种子散播在台湾各县市,推动实现台湾社会的“政治世代交替”。

(三) 提出追求“世代正义”的青年政策

“世代正义”是世代政治学理论在探讨“代际关系”时所提出的概念。由于资源分配与价值观念

的差异,隔代间会出现“代沟”。B.贝特海姆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造反的根源在于代际冲突。^[26]这种“代际冲突”在处于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台湾愈发明显。截至2013年,台湾15岁以上,具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为815万,较10年前提升了11.2%。在“20-24岁”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77.32%。“35-39岁”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56.1%。“25-29岁”与“30-35岁”两个年龄段分别有12.35%和11.27%为研究所学历,^[27]却因供求失衡导致出现“流浪博士”的现象。作为高等教育制度过度放宽的后遗症,台湾“新世代”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从而衍生出“代际不公”或“同代不公”的社会问题。客观地说,过去7年,马英九当局借助两岸经贸、联结亚太地区,给台湾引入经济活水层面建树不少,但是产业升级仍是阻碍台湾经济再成长的症结,产业升级停滞不前。被遗留在岛内的“新世代”沦为“待业族”、“青贫族”和“无壳族”。

作为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高举“世代正义”的青年政策口号,并非单纯只提供一个让“新世代”宣泄情绪的平台,“青年议会”同时还邀请该党在当地的候选人或党籍公职人员,实现从“意见”到“政见”的现场转换。以已举办过两场“青年议会”的台中为例,时任民进党籍的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始终全程参与。林一边听取“新世代”的各种意见,一边现场对他们关心的房价、BRT、旧城更新、智慧防灾与青年参政等议题做面对面的回应,取得年轻人好感,并协助其高票当选。

截至2014年11月底,“青年议会”已经举办8场。民进党青年部以此为平台,抛出各种议题,收集各县市各行业的“新世代”对公共政策的态度与意见,并公布与传播该党的青年政策,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议题紧跟“新世代”的所思所想,尤其着重于教育、就业、房价等与“新世代”有着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二是选择在“新世代”集中聚居且世代冲突较为明显的地区举办。如尚未完成城乡整合的台中、北上求学打工者聚居的桃园、依附在台北市的制造业重镇新北市以及一直被“中央”遗忘的农业大县云林。这些县市皆处于产业转型“阵痛期”,“新世代”生存发展陷入困境,迫切需要一个平台宣泄对执政当局政策的不满情绪。三是受众范围不断深化与年轻化。“青年议会”不只局限于邀请政治参与度高的“行动派”,还两度直接进入校园,与更多的“宅男”、“宅女”面对面,拓展传播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深绿重镇”高雄,“青年议会”已向下延伸至“高中部”,借助高雄长设的“人权学堂”对已在课堂中学习《公民与社会》课程,尚未有投票权的更年轻世代进行民主教育与政治训练。

(四) 运用全媒体技术,与“新世代”实现网络串联

台湾“新世代”也被称为“E世代”。通过“打卡”、“PO文”或“APP转发”,实现由点到面的快速传播是他们最熟悉的社交途径。原本松散的网络民意在“新世代”手中转化成为“键盘力量”,聚集起一股真实的民意。在近两年台湾社会爆发的“洪仲丘事件”、“国光石化”与“反核四”等议题上,“新世代”借助网络平台,完成包括“快闪抗议”、“凯道声援”等政治串联。尤其突出的是“太阳花学运”,学运领袖几乎都是通过社交平台与手机APP或LINE程式发布消息与行动指令。

民进党对“全媒体”时代的社交途径并不陌生。早在2010年“五都”选举时,青年网军就为蔡英文在新北市赢得百万选票立下汗马功劳。由那时起,民进党就从未放松过运用新媒体在虚拟空间与“新世代”实现政策传播与串联。除了前文提及的由网络收集议题再转向实体论坛的“青年议会”之外,继蔡英文等民进党政治人物在包括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开设账号以及开通“民进党专用APP程式”后,2014年7月,民进党LINE@官方账号“@dpponline”正式上线,实现网络空间与手机移动终端的“全媒体覆盖”。蔡英文强调这将拉开数位党部计划“DPP on Line”的序幕,^[28]极大地吸引“新世代”对民进党的关注程度,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选举效果。

台湾专栏作家徐歙煌梳理“九合一”选举中所创下的“四个第一”中有三个都与网络和新媒体有

关,即“第一次高度依靠社群网站”、透过募款网站实现“民众自发性动员程度最高”以及“网络数位媒体影响力超过电视等传统媒体”。^[29]为了让候选人第一时间接近网友,蔡英文与民进党各候选人推出“脸书 LIVE”、积极参与“乡民有约”、“市长给问吗”等类似专访的网络活动,拉近与“E世代”的距离,大大地扭转了过去青年人对政治冷漠的态度。当这些平时不接住家民调电话的“网络族”和“手机族”的政治热情被点燃,受到冲击的就不仅是传统的民调数据,更是候选人或某个政党的成败。

三、民进党与台湾新世代互动模式的成效评价

(一) 适应政治社会化与政党转型的需要

世代政治学理论坚持认为“世代交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面对不同的选民与社会环境,政党需要主动转型适应政治社会化的“世代变迁”。对于台湾而言,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仍处于深化与巩固的阶段。“新世代”对政治生态的冲击力迫使每个政党都需要调整与完善自身的政策来回应青年人的诉求。民进党在这一点上的“敏感度”比执政的国民党高。运用的传播手段与互动方式,通过普世价值观的相互串联,令该党在“新世代”中的认同度较高。

但建构主义认为“认同”并非一成不变。在“利益”与“身份”发生变化之后,“认同”自然会被改变。2008年马英九获得大量年轻世代追捧,而7年后却成为年轻世代取笑、反抗对象的鲜明反差,说明单纯的政治动员与感性诉求缺乏可持续性,需要有更具体的“利益支撑”才能巩固“认同”的忠诚度。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过程中同步推出的“青年议会”计划正有实现“认同”巩固的目的。但民进党党籍候选人在“青年议会”中承诺的“政策支票”在其当选后,有多少内容与多大程度上兑现成实际政策,还有待观察。

(二) 辅助民进党实现“赢回台湾”的目标

从蔡英文首次掌舵民进党开始,该党就一直在积累再次政党轮替的能量。第三度执掌民进党后,蔡英文就打出“从地方开始 赢回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目标。为应对“公民力量”与“无党籍参政”对民进党的冲击,蔡英文推出“青年议会”与“民主小草”计划。梳理前者至今为止的选题,无不与“新世代”所关心的“世代正义”、“居住正义”、反财团剥削与反贪腐等议题相关,自然能引起“新世代”共鸣。而后者则破除了党籍的桎梏,对“新世代”的“民主进步青年”进行选举“实践教育”,完成从“素人”到“精英”的政治塑造,为蔡英文提出的“世代接班”提供足够的后备力量。事实上,这两个计划的成效已经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有所呈现。在有62万“首投族”参与的此次“九合一”选举中,仅以县市首长选举的政党总得票数来看,民进党大胜国民党83万多票,^[30]超越了2012年“大选”负于国民党79万票的得票差距,说明“新世代”的政治认同已被民进党抢得先机,并将直接影响2016年“大选”的政治走向。

(三) “新世代”崛起对台湾政治的正反效应

传统上,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参与度不高。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在2010—2011年针对2008年台湾“大选”的青年群体有过投票率的调查,结果显示“首投族”的投票率仅为18.2%,“24—29岁”青年的投票率也只有48.4%。^[31]但从台北文林苑、苗栗大埔抗拆迁、声援“广大兴”船长等事件开始,这群沉默的“新世代”变了。台湾《商业周刊》在2013年8月对被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公民1985行动联盟”通过网络串联实现凯道的“万人送仲丘”的画面震惊。震惊的不仅是“公民力量”的强大,还有“新世代”如此高涨的不满情绪。^[32]生长在两岸和平、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台湾的“七年级生”和“八年级生”少了父辈们那份“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多了一份“小确幸”式的优越感。但

这份优越感却在现实生活遭遇挫折。2014 年 11 月公布的受雇人员平均月薪约为 3.5 万新台币,还有 348 万工薪族月收入不足 3 万新台币。^[33]这样的数据在重挫“新世代”信心的同时,也显示出执政当局的经济政策并未转化成为年轻人的实惠。

台湾智库在“九合一”选举后的民调显示,在此次选举中“20-29 岁”族群的投票率为 74%、“30-39 岁”族群则为 78.2%,远高于过去年轻族群平均六成左右的投票率。^[34]被“新世代”所追捧的民进党候选人纷纷当选,国民党支持率一落千丈。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进党与“新世代”的互动模式是成功的。作为政治系统的必然传承者,“新世代”的政治取向与政策诉求将影响全社会的政治走向。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新世代”当前与民进党较为成功的互动背后的最大催化剂是对马英九执政当局政策共同的不满。对民进党而言,首要任务是借助反“马”势力实现 2016 年“赢回台湾”执政目标。但“新世代”绝不简单诉求于蓝绿两党再次轮替,让民进党再“做做看”,而是需要一个明确的发展前景。若是这种真正的政策诉求得不到被他们投票支持而顺利当选的候选人未来的政策回馈,这股冲击力同样会产生新的“余波”,出现民意的再度“钟摆”。这对于正处在政治民主化巩固期的台湾社会而言,将会是另一个需要关注与思考的难题。

四、结 语

世代政治学理论对于“新世代”政治取向的关注源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每个社会而言,新的世代就如同生物学上的“新品种”一般,推动社会发展。作为政治系统中最需要适应环境的政党,实现与“新世代”的良性互动,不仅可获取足够的政治资本,更可延续政党的生命。这一点,在民进党身上非常明显。关心民进党与台湾“新世代”的互动模式,并不是为了简单印证成败,而是借助这个角度来探测台湾社会的民意变化与政治走向。

注释:

- [1] [7] [9] [26] 沈杰《青年、世代与社会变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 年第 3 期,第 2 页,第 6 页,第 3 页,第 6 页。
- [2] Mannheim K.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Legan Paul, 1997: 276-322. 可参见沈杰《青年、世代与社会变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 年第 3 期,第 4 页。
- [3] [美]理查德·布朗加特、玛格丽特·布朗加特《世代政治学》孙嘉明译,李国海校,《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 年第 12 期,第 28 页。
- [4] 胡佛、陈德禹、朱志宏《权力的价值取向:概念建构的价值与评估》,《社会科学论丛》(台湾),1978 年第 27 期,第 3-40 页。
- [5] [美]史蒂芬·弗兰泽奇《技术年代的政党》李秀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13-20 页。
- [6] 参见台湾《内政统计通报》,台湾“内政部统计处”,2014 年 1 月 18 日。
- [8] 蔡英文曾说“我们的民进党团最主要的成员,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四十岁左右,这是我们民进党的新的世代,也是我们民进党将来的希望,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从 2012 年开始挑起下一个世代的责任。”详见 <http://www.0755.net/News/NewsShow-8227.html>。
- [10] 依游清鑫的划分,“前 92 世代”为 1971 年前出生的台湾人口,其对国民党威权统治以及退出联合国、台美断交等重大政治事件有着深刻的记忆,因而相对保守而沉默。“后 92 世代”则为 1972 年后出生的台湾年轻人,其目睹了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瓦解与台湾民主化,推崇普世价值观,政治参与热情较前一代要高。参见游清鑫《以新选民的姿态论台湾民主政治的未来》,《台湾民主季刊》(台湾)2007 年第 3 期。
- [11] 朱峰、刘玉军、马立平《世代政治学视角下国民党与台湾新世代互动模式变迁研究》,《青年探索》2014 年第 6 期,第 31 页。
- [12] 张铁志《从小确幸到新世代公民》,2014 年 4 月 24 日,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4/04/24/taiwan-young-people-become-citizen/>。

- [13] 徐仁全《六成五台湾人视大陆人为最大对手》,《远见》(台湾) 2009 年 7 月期,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5109_8.html。
- [14] 张文生、王茹《民进党选举策略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 年,第 130-140 页。
- [15] 唐次妹《2010 年台湾“五都”选举民进党竞选策略——以政治营销学的基本模式解析》,《台湾研究集刊》,2011 年第 4 期,第 22 页。
- [16] 针对 2012 年“大选”,民进党在“小英之友”的基础上,建立了针对校园青年的“小英同学会”以及面向网络族群与手机族群的万人青年志工团——“小蜜蜂青年军”。台湾媒体发现,在 2012 年 1 月 14 日“大选”败北当晚,冒雨聚集在蔡英文新北市竞选总部前的年轻人比例也远高于赢选的国民党。
- [17] 参见《三度重返贡寮,蔡英文:分享乡亲福气,年底选举顺利》新闻稿,民进党文宣部 2014 年 5 月 31 日。
- [18] [22] 参见《公布青年议会和民主小草参政计划,蔡英文:连结青年开启政治新页》新闻稿,民进党文宣部 2014 年 7 月 15 日。
- [19] 蔡英文《传承与超越:迈向台湾民主的第三条路》,民进党文宣部 2014 年 9 月 13 日。
- [20] [28] 参见《民进党第十六届第一次全代会蔡英文主席致词全文》新闻稿,民进党文宣部 2014 年 7 月 20 日。
- [21] 蔡英文《年轻人应培养“问问题”及“组织”能力》,民进党文宣部 2014 年 7 月 30 日。
- [23] 参见《出席“民主小草”记者会 蔡英文:参与就是改变政治的起点》新闻稿,民进党文宣部 2014 年 9 月 9 日。
- [24] 参见《“民主小草”里长候选人冲刺扫街从基层翻转台中》新闻稿,民进党文宣部 2014 年 11 月 22 日。
- [25] 参见《民进党第十六届第十五次中常会》新闻稿,民进党文宣部 2014 年 12 月 3 日。
- [27] 台湾《内政统计通报》,台“内政部统计处” 2014 年 4 月 5 日。
- [29] 徐歙煌《打脸国民党打到崩盘!看年轻世代写下“四个第一”》,《联合报》(台湾) 2014 年 11 月 29 日,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807/545397>。
- [30] 2014 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数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 2014 年 12 月 1 日, http://vote2014.nat.gov.tw/zh_TW/PC/0000000000000000.html。
- [31] 章英华等《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第六期第一次调查计划执行报告》,台湾“中央研究院” 2011 年 3 月,第 225-228 页。
- [32] 《一场对公义的焦虑,串联出台语版〈悲惨世界〉》,《商业周刊》(台湾) 2013 年 8 月 5 日,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1337>。
- [33] 《348 万人穷忙,月薪不到 3 万》,《自由时报》(台湾) 2014 年 11 月 28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834375>。
- [34] 《九合一选举投票行为调查 选后民调分析记者会会后》新闻稿,财团法人台湾智库 2014 年 12 月 02 日,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5/61/2909/0>。

(责任编辑:张文生)

An Analysis on the model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PP and the New Generation in Taiwan

Li Shiyan

Abstract: Political science for generations has emphasized that different social vicissitudes affect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party identity and policy demand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the DPP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a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so as to obtain its political capital and to hasten the process of the power rise of the new generation, thus forming a unique interactive mode.

Key Words: generational politic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new generation, interactive mode